

**朱大可说：**

**今天，我们这些老狗来为小狗们站台**



时间：2016年7月11日（下午）

地点：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题：“谜托邦”系列小说发布会

主持：耿潇男

主办方：现代文学馆，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当当，腾讯网，东方出版社等

##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7月11日下午，由朱大可工作室出品的“谜托邦”类型小说新书发布会于现代文学馆多功能厅举办，此项活动由现代文学馆和同济大学文学批评研究所联合主办，也是当当阅享之旅的活动之一。

“谜托邦”缘起于朱大可先生的《华夏上古神系》，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学术著作，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朱大可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把他的这一部分研究做成非常接地气的小说，由此诞生了“谜托邦”这一类型小说品牌。

活动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以朱大可工作室“谜托邦”为讨论主题，第二个部分就是探讨中国“类型小说”如何走向好莱坞，中国原创类型小说的内容可不可以走进好莱坞，可不可以靠近好莱坞形式的电影工业，这个覆盖到多个艺术领域的跨界话题吸引到来自文学界、影视界、投资界的各位大咖来共同进行探讨。

作为主办方也作为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指着坐在台上的大咖们，谐称今天是几位老狗来给小狗们站台，让80后和90后的小狗们叫得更欢。他接着给“谜托邦”第一季的四部作品做了简要介绍，并从文化消费领域对这批作品的意义进行了诠释。

朱大可尖锐地指出，中国今日的文化消费领域存在三个空心化：第一，“价值空心化”：时下流行的所有的那些娱乐产品都存在很严重的价值观问题。第二，“文化空心化”：现在的文化消费对于传统文化、对于民族的视觉样态，没有足够的研究和传承。为什么在动画电影里出现的来自于山海经的视觉形象可以令我们感到陌生和新奇？因为人们的文化传承出现了断裂，对古代文献的阐释处在碎片化的状态，对于中国传承的神话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中国的历史的神话本来就缺乏统一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必须重新整理，而不能即拿即用。第三，“学术空心化”：对神话资源进行整理，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支撑，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并且是放到一个新的逻辑架构里面进行认知，这个架构既要跟当代的全球文化打通，也要跟上游的整个古代民族历史打通，这就是双向打通的工作。



虽然深为此现状感到痛心，朱大可承认，不可能单靠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改变整个中国，所以他更愿意将他目前所做的工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一方面他在学院内授课，向年轻人输运一些有用的知识和有意义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在工作室，他和年轻的创作者们一起投入思考和策划，推动他们来进行创作。工作室的集体创作和过去的个体创作有很大区别，一个故事从种子到提纲都是集体完成，反复讨论，有些故事经过一年的讨论和打磨才进入写作状态。朱大可先生认为，文学通常是随性的、可以进行自由发挥的，一定程度上是个人心性的一

种直率表达，但在类型小说的框架里，故事需要在创作前期进行严密的打造，使它在逻辑上，在人物的塑造上，在故事的情节推进上，都站得住脚，都经得起晃动，在这个基础上再由一位作者执笔完成。“谜托邦”第一季的四本书，都是这样完成的。

朱大可先生特别指出：打造故事的过程，实际就是寻找神话原型的过程。如《美人鱼》就是借鉴“灰姑娘”的神话原型，人们希望在悲惨的结局里面找到一个明亮的上升的道路，这是人类的集体意识。找到了可以唤醒集体意识的神话原型，就建构好了小说最重要的基础，阅读的基础和价值观的基础，这是他们前期所有准备工作里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他进一步明言，一旦掌握住原型，实际上相当于掌握住了通往大众心灵的一把钥匙。在此基础上，工作室建构了一种新的“类型小说”范式。“类型小说”在西方已经发育得非常正常，分类非常清楚，而在中国还没有做到像西方那种科学的分类体系。团队现在想做的，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跟西方接轨的、同时又在中國能够落地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们的工作室基于神话研究的前提，更侧重于跟神话有关的小說，西方叫做幻想小说，中国可以叫做魔幻小说。这是工作室主打的产品，同时他们也会涉足到都市悬疑和历史悬疑，这是副产品。

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能够跟读者建立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但是缺点是作者没有主体性，写作过程中会受到读者意见的左右。朱大可先生非常感谢东方出版社，以他们强大的资源支持这个年轻人的写作实验，让它们以平面媒体和纸本书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以数码方式出现，这会大大改善作家个人的创作环境，虽然故事在前期是集体设计，但是在进入写作阶段之后，个人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个性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出来，找到执笔者自己的路子，并形成自己的风格，至于这条路径是否能够成功，则要交给时间。

总言之，朱大可先生将这些尝试称之为一个实验，而无论实验是否成功，都会给这个时代以必要的启示。

## 王圣杰：“什么才是好故事？”



“卜知客”团队的故事代表王圣杰上台发言，以“好故事”为主题对团队和工作室的观念进行阐释。

他提出，“好故事”的定义是故事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创作者既要认识故事素材，也需要认识人，需要认识历史和认识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为此创作者需要学术这把手术刀，从一个尖锐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这种素材，从中发现自我，发现真情。

延续朱大可先生的思路，他再一次强调了“原型写作”的重要性，团队通过研究《千面英雄》这一著作，逐渐明白好莱坞电影所讲的“英雄之路”是经由召唤、冒险、拒绝召唤一步一步展现出来的。神话是最原生的素材，结合我们所有原生的想象，也是生命历程中经历的第一次命运抉择，神话可以赋予创作者巨大的能量。

他动情地说，团队是发自内心地认真对待这四部作品，也希望他们所表达的自我和真情能够被大家看到，他们的愿望不是想在市场里面分一杯羹，而是成为勤勤恳恳的“做粥人”。

## 诸大咖：“类型小说”开启文学想象之门



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著名作家李洱指出，现代文学馆第一次举办“类型文学”有关的活动，能在这里看到年轻的写作者，他感到很高兴。很多西方小说是从《圣经》里面引出来的新故事，而他现在发现朱大可工作室计划从中国的神话里面引出新的故事，同样令他感到喜悦和期待。同时他也坦承，对他而言并不存在明确的纯文学与“类型小说”的分界，如何界定类型文学？如何去进行“类型小说”的集体写作？这些值得创作者深入思考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肯定了谜托邦富有想象力的创新写作形式，并提出几点思考。第一，在全媒体的时代，文学怎么生存，文学怎么发展？文学怎么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问题。第二，虽然定位为“类型文学”，卜知客团队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气质，就是虚构的无限化。长期以来文学一直强调现实主义来源于生活，而在文学虚构方面，我们需要一种想象能力，这要从宇宙论的基础上看。例如刘慈欣的小说和诺兰的电影，是在宇宙论的空间里面思考人类的存在。“类型文学”打开文学的想象力之途，以及文学发展的道路和未来方向，提供了一种富有启示性的探索。



作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著名作家邱华栋对“类型小说”的态度更为平和纯正。他打了个比方：文学是一个金字塔，塔尖上是几位大师，探索人类的精神指向，心灵的方向，人类的存在等等，文学的存在即是出自于人们对这些深刻问题的好奇心。但是好奇心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武侠、侦破、魔幻，人类的好奇心有很多指向。现在朱大可先生把“类型小说”引向神话写作，想找到一种跟当代年轻人能够连接起来的状态，从而推出“谜托邦”系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另一方面，邱华栋先生对“类型小说”的品质有自己的标准，他真正想看到的是《魔戒》《我的名字叫红》《玫瑰的名字》这种高级的类型小说，所以他对年轻的创作者也提出了期许：年轻人已经开始起跑，但是终点很远，务必要谨记，真正的故事和写作资源永远来自于我们自身。



文化学者、著名诗人欧阳江河从文学和理论切入，对“故事”的要义提出一种具有诗性的理解。他向新一代作者提出建议：不用去考虑太多传统意义上或者经典意义上的文学性，而是要去思考好的故事，包括把故事转化为影像的可能性，包括如何在故事中发现新的神话模式。建设新故事的同时我们也在建设现代性，然后再来包装和呼应原有的传统性，由此造成一个博弈。

欧阳江河也对目前的故事抱有疑虑和期待：包括《魔戒》和中国神话，是不是具有这种文化意义上的能量？中国那么多的神话，是否缺乏这种意义上的建构能力？是否能从这个角度理解和创作故事，取决我们对神话、传统、当代文化所做的提炼，以及这种提炼所包含的总体理性和智力水平。



劳雷影业董事长、著名制片人方励先生提出，向好莱坞靠近的方向是可疑的，因为好莱坞只提供了好的管理制度，但它的内容其实是非常贫乏的。美国历史多么短暂，跟我们无法相提并论。另外，文学创新道路在方向上，包括在口号上面，都要慎重，因为毕竟文学和电影是两码事，受众阅读和观影的方式都不一样，规制不一样，节奏不一样，表达的形式也不一样，但也有共通的地方：作者的情怀、感情还有我们的想象力。在与编剧和制片人接触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问题是，在这个功利的时代，人们心里长了太多的杂念的时候，故事的原创力量缺乏。他对年轻一代的创作既有担心，又充满期待，希望年轻作者能够杀出一条血来。中国市场快速成长，内容、资金和人力均不缺乏，缺的是有想法、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原创作者。



万合天宜CFO陈伟鸿先生强调，好莱坞电影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它的价值观上。好莱坞电影也有80%的失败率，但是漫威英雄之所以能占领全世界的电影市场，是因为它高度符合人类普适价值观，满足各地区人类的共同愿望。

陈伟鸿先生指出：从根本上说，人心里最重要的是信心、希望和爱，只有把这三种价值反映出来，才是好的文学作品。中国民族是有深厚历史的民族，虽然现在的方向不很明确，但是他相信，中国的文学、电影和原创内容一定能走向世界，他很愿意和朱老师的团队一同往这个方向努力。

接下来，方励对工作室团队给出了两个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集体的智慧要和个体写作结合，也要注重个体的风格；另外，想象力飞得远，但也要收得回来。



著名文化学者余世存老师则是从他的观察视角，向方励先生唱了一个小小的反调，他认为中国创作者不缺内容，国家、社会、时代每时每刻都在盛产内容，“类型小说”的责任应该是记录和报道中国，和世界打通。可以进入“类型小说”的很多题材，我们都看不到，比如说上法庭打官司的小说，医院就医的小说，拆迁的小说，都看不到。但是好莱坞写出了《阿凡达》，那是伟大的拆迁小说。

反观中国有没有这么好的作品？余世存老师心目中伟大的“类型小说”，比如说《三国》、《水浒》，都是集体创作的结晶，更能获得他的认同。



21世纪传媒电影中心总制片人、著名传媒人郭国松老师附议余世存先生振臂高呼：中国人并不缺乏想象力，反而，中国是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一个民族，相比于美剧和好莱坞电影，在当代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犯罪大片，我们真正缺乏的是把现实记录下来的勇气。他即兴对一首诗进行了再创作，呼喊“花儿开了……你开吧，直到春天来临，漫山遍野。”大声呼唤原创故事的春天。